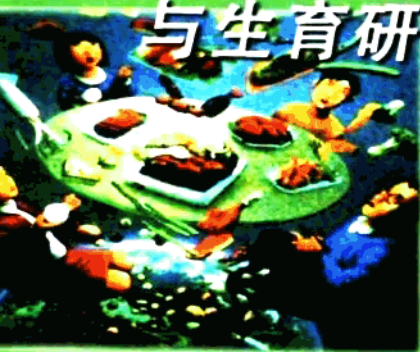


中国 家庭经济 与生育研究



田雪原 主编
胡伟明 副主编

中国经济出版社

撰 稿 人

绪 论	田雪原
第一部分	
第一章	梁本凡
第二章	刘启明
第二部分	
第三章	胡伟略
第四章	嵇平平
第五章	才多多
第三部分	
第六章	李小平
第七章	李小平
第四部分	
第八章	郭汉英
第九章	邵夏珍
第十章	邵夏珍
第五部分	
第十一章	高嘉陵

目 录

绪论

一、中国的改革开放与微观人口经济发展·····	(1)
(一) 由农村开始的改革·····	(2)
(二) 城市改革的深入·····	(6)
(三) 市场经济与微观人口变动·····	(8)
二、西方微观人口经济学说·····	(14)
(一) 人口与经济关系研究概说·····	(14)
(二) 当代西方微观人口经济理论·····	(17)
三、中国家庭经济、孩子成本效益与生育研究·····	(21)
(一) 理论的借鉴与局限·····	(21)
(二) 开展调查与研究·····	(24)

第一部分 孩子成本

第一章 孩子成本的概念及其估算方法·····	(28)
第一节 孩子成本的概念·····	(28)
第二节 影响孩子成本估算的因素·····	(35)
第三节 直接成本的估算·····	(37)
第四节 间接成本的估算·····	(43)

第二章 孩子成本的现状及其趋势分析	(51)
第一节 孩子成本分析的若干经济学概念	(51)
第二节 孩子成本的现状构成分析	(53)
第三节 孩子成本的变动趋势	(62)
第四节 孩子期望成本的多因素概率分析模型	(65)

第二部分 孩子效益

第三章 孩子效益构成分析	(74)
第一节 研究意图与若干概念说明	(74)
第二节 孩子效益构成一般特征	(77)
第三节 孩子经济效益	(82)
第四节 孩子养老效益	(87)
第五节 孩子精神效益	(93)
第六节 孩子总效益问题	(98)
第四章 孩子效益的多因素分析	(111)
第一节 家庭收入与孩子效益	(111)
第二节 父母受教育程度与孩子效益	(120)
第三节 父母的职业与孩子效益	(125)
第四节 孩次、性别与孩子效益	(130)
第五章 分居子女与家庭的经济往来	(138)
第一节 “财富流”理论的评价与运用	(138)

第二节 影响分居子女与家庭经济往来的因素分析	(140)
------------------------	-------

第三部分 孩子的价值结构与期望孩子的交易价格

第六章 孩子的价值与价值结构	(150)
第一节 孩子的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	(150)
第二节 孩子的价值结构	(157)
第三节 孩子价值结构的实证研究	(166)
第七章 期望孩子的交易价格	(199)
第一节 期望孩子的交易价格	(200)
第二节 期望孩子交易价格的实证研究	(208)
第三节 期望孩子交易价格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218)
第四节 期望孩子交易价格的运用方法	(222)

第四部分 生育意愿

第八章 关于生育意愿的一般理论	(229)
第一节 生育意愿的一般概念	(229)
第二节 影响生育意愿的一般因素	(237)
第九章 我国家庭的育前生育意愿	(250)
第一节 我国城市家庭的育前生育意愿	(251)
第二节 我国农村家庭的育前生育意愿	(258)
第三节 育前生育意愿对实际生育数量的影响	(263)

第十章 我国家庭的育后生育意愿.....	(266)
第一节 我国城市家庭的育后生育意愿.....	(266)
第二节 我国农村家庭的育后生育意愿.....	(273)

第五部分 抽样调查

第十一章 中国家庭经济与生育研究抽样调查方案及其目	
标量估计方法.....	(281)
第一节 总体与抽样方法的确定.....	(281)
第二节 分层抽样的原则和方法.....	(286)
第三节 样本量的分配.....	(292)
第四节 抽样的流程和操作方法.....	(294)
第五节 目标量的估计方法.....	(303)

绪 论

世界各地迅速的人口和社会经济变动过程 已影响到家庭形成的方式和家庭生活

——联合国《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行动纲领》1994. 开罗

在 20 世纪即将结束和 21 世纪行将来临之际，谋求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成为全人类共同关注的最重要命题。中国政府履行联合国环发大会《21 世纪议程》的承诺，率先制定了《中国 21 世纪议程——中国 21 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将经济的发展、人口问题的解决、环境的保护等作为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基本立足点提了出来。人们发现，当今任何一项问题的解决都不是孤立的，而是互相联系和彼此互动的。中国自 70 年代以来控制人口增长取得举世瞩目成就，无疑首先归功于认真贯彻落实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结果；同时也不可否认，在根本动因上得益于发展，尤其得益于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超高速增长，以及科学、文化的发展和包括生育观念在内的传统观念转变的结果。然而在论及人口与经济的相互作用和影响时，还要同时借助望远镜和显微镜：既重视宏观上的考察，如人口出生、死亡、迁移等变动与国民生产总值、国民收入增长等经济发展的关系；又要注重微观方面的研究，特别是作为人口再生产基本单位的家庭生育与家庭经济方面的研究。

在中国，这后一个方面的研究是比较薄弱的，但在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新形势下，却是异常重要的。

一、中国的改革开放与微观人口经济发展

中国家庭经济与生育研究，特别是将二者之间的关系理论清

楚，除了借助于国内外已有研究成果进行一般的静态分析外，则必须结合中国实际，尤其是改革开放实际做出动态研究。因此，本书以农村和城市的经济改革作为切入口，这对于全书的分析和论证都是重要的。

（一）由农村开始的改革

1978年12月，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批驳了“两个凡是”的错误，进行了理论上的拨乱反正，明确作出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深入讨论了农业问题，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发到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试行。农业问题的两个文件强调在经济上要充分关心广大农民群众的利益，在政治上保障他们的民主权利，尊重公社和生产队的自主权，按劳分配，以及不得干涉社员从事自留地、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等活动。显然，这同以往文件精神大有不同，过去下发文件着重强调的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割资本主义尾巴”，因而在全国农村引起很大震动，率先引起震动的是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

凤阳县是出了名的贫困县，有这样几句民谣：

说凤阳，道凤阳，
十年倒有九年荒。
自从出了个朱皇帝，
百姓从此更遭殃。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过土地改革和农业合作化运动，广大农民生活比过去有所改善；但在追求“一大二公”，“穷过渡”极左思想指导下，直到70年代仍十分落后，一些人逃荒在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有如春风化雨传来，春节刚过，小岗村除2户人家外出未归，18户人家召开“秘密会议”，商定了实行“大包干到户”，“瞒上不瞒下”，万一走漏风声支部书记进班房，其余17户将其孩子抚养到18岁协议，摁上18户人家的手印。第

二天清晨，小岗人来到属于自己“包干”的土地上开始了20多年来全新意义上的劳作，那种与土地休戚与共、精耕细作的传统又重新降临，当年小岗村人均收入超过400元，为当时全国农民人均收入的2.5倍，一下子由贫困进到温饱水平。改革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中国农村改革迅速由此推广开来，几年内完成了以户为单位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到1983年底，全国实行联产承包制的已占到总农户和生产队数的95%以上，标志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第一个任务的基本完成。新体制的建立和不断完善，为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走向市场经济创造了条件，表现在：

第一，农民获得生产和经营自主权。在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经济体制下，公社一级拥有的财产归公社范围内集体所有，生产大队一级拥有的财产归生产大队范围内集体所有，生产队则拥有农业生产经营的基本财产，对土地、山林、水利设施、农具、耕畜等有权支配和使用，并有权调配本队内劳动力的使用，为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经营自主单位，农民个人处于被支配的地位。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一般将土地、山场、林木、池塘等生产资料按产量产值包给社员户，超产超额归己或分成奖励，未完成产量产值受罚的一种“一揽子”承包办法。虽然这一办法未改变土地等的生产资料所有权，但是承包一经确定，且一般承包时间较长，刺激了农民对土地改良、山地修整、林木更新的优选、池塘整治、水利维修等的积极性，投入增加。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表现出所有权与使用权既相分离又相结合的情况。就所有权来讲，同改革前没有什么区别；就使用权来讲，则有天壤之别，农民事实上成为土地的占有者，不仅是使用的全权支配者，而且可以进行投资、转包、联合经营等举动，唯独不得进行土地买卖。市场经济要求产权明晰化，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实践上解决了生产和经营权归农民的问题，为农民走向市场经济打开通道。

第二，农村专业户和新经济联合体的出现并获得发展。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焕发了广大农民的劳动热情，农业劳动生

产率提高很快，在资本和劳动力两方面为发展专业化生产作了必要准备。随着生产力和分工的进一步发展，不仅出现猪、牛、马、羊、鸡、鸭、鹅、兔等饲养专业户，而且出现规模较大的粮食、棉花、油料、林场、果园等种植专业户，将农村的商品生产迅速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推动了走向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菜篮子工程”作为城乡结合天然的市场工程，对促进城乡市场经济的融合起到一条纽带的作用，提高了农产品的商品率。在专业化生产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的经济联合体，有别于人民公社的合作经济，它没有任何行政组织色彩，而纯然是适应生产力发展和市场经济需要，真正出于自愿互利、提高经济效益的经济组织。这种新的经济联合体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就将窥测方向瞄准市场，将农村经济发展带进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大潮中去。

第三，乡镇企业和农村私营企业的发展。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一些原有社办、队办企业财产一时不好分配，镇、乡、村政府自己或委托别人承包下来，成为早期的乡镇企业。这种乡镇企业有原有的固定资产作基础，当地有较充裕的劳动力和原材料，又有当地行政部门的扶植，在体制转换之机借助市场作依托而发展起来。一些没有原来社办、队办企业的地方，更主要的是在承包后迅速发展起来的家庭，瞧出“无工难富”门道儿，纷纷如法炮制，出现乡镇企业空前发展的局面。据统计，1978到1992年，全国乡镇企业由152.4万个增加到2079.2万个，增长12.6倍；从业人数由2826.6万增加到10581.1万，增长2.7倍；总产值由493.1亿元增加到17975.4亿元，增长35.5倍；纯利润由88.1亿元增加到477.6亿元，增长4.4倍。^①与此同时，农村私营企业迅速增长，其中大部分私营企业主为农民，农村各级干部、个体户和社会闲散人员所占比例不足3%。乡镇企业和农村私营企业的崛起，以市场为生存和发展之本，不仅促进了农村商品和

^①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3》，中国统计出版社，1993。

市场经济的发展，而且对整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是强有力地推动。

第四，人口流动和劳动力市场的形成。我国农村原本存在大量过剩人口，对剩余劳动力的估计在1亿至2亿之间不等，但在旧体制下被束缚在土地上，只能以潜在过剩形式表现出来。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民有了生产和经营自主权，没有必要自己对自己潜在过剩；而封闭、半封闭状态的被打破和商品流量与日俱增，人口流动随着增长，过剩人口和劳动力以绝对过剩形式表现出来。一些调查表明，目前全国流动人口总数超过8000万，主要是农村过剩劳动力涌向城市，尤其是涌向东南沿海开放城市的“民工潮”大军。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进行和对劳动力管理的加强，劳动力市场逐步形成，填补了市场形式中的一个重要方面。而流动人口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在城市中找到相应的职业，成为事实上迁移居住在城市的人口，加速着人口城市化的步伐。

除此之外，国家在政策上减少以致取消对粮、棉、油等农副产品征购数量和品种，提高收购价格等促进了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引导农民走向市场。通过全面地看待农村经济改革对市场经济体制形成的作用和影响，在肯定有利的主导方面的同时，也要注意广大农民真正进入市场经济，农村经济全面纳入市场经济体制获得健康发展，仍有其艰巨性的一面。小农经济存在上千年，传统的经营方式、思想观念、习惯势力根深蒂固，农民进入陌生的市场经济未免步履艰难。前面提到的农村改革第一村的小岗人在改革之初就立即见效，然而在10多年中却进展不大。缺少资金、缺乏人才、条件较差是客观原因，而传统观念，包括“传宗接代”旧生育观念在内的影响，缺少市场经济新观念，满足于种好地、吃饱饭才是最主要的原因。当小岗人意识到这一点以后，通过到经济特区开阔眼界和向先进村典型学习经验，转变观念，便又走出招商引资、走向市场经济发展的新路子。不仅如此，前面提到的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有利于市场经济的诸多方面，同

时也存在着一一定的局限性或不利因素。如乡镇企业的发展拓宽了市场经济视野,然而乡镇企业多存在政企不分、产权不明问题,多数为高消耗、低产出、低效益企业,加剧着能源、原材料紧张和环境恶化。又如人口流动和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人口流动和城市化步伐的加快,在使生产力中人的要素活跃起来的同时,造成某些农村责任田荒芜,流动人口使城市基础设施无法承受,就业压力增大等新问题。所有这一切,即首先开始于农村的经济改革的积极的和某些一时难以除却的消极方面,必将深刻影响到农村家庭经济变革,是一次革命性变革。毫无疑问,这样的经济变革必将对人口生产产生深远影响,尤其是家庭的生育行为。

(二) 城市改革的深入

继农村经济改革之后,城市经济改革也接着展开。城市经济改革紧密结合开放,改革与开放相互促进不断深入。1979年设置深圳、珠海两个“出口特区”后扩展为经济特区,并增加汕头、厦门二市,以及海南省。1984年批准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14个市为对外开放城市,并在其中一些城市兴办经济技术开发区。同时国务院相继通过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法实施细则》、《关于进一步办好中外合资企业的报告》等文件,大胆吸引外资,扩大出口贸易,加快了沿海地区的经济起飞,改变着人们的观念。外资独资和中外合资企业的发展和新的经营管理方式的出现,使人们耳目一新,了解到现代企业经营管理为何物,平等竞争、人才流动为何物,市场经济为何物,为何必须进行以企业改革为核心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企业改革起源于四川省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围绕放权让利展开。先是打破由国家统收统支将企业包下来的办法,试行利润分成。利润分成起到一定的作用,调动了一部分企业的积极性;但由于管理体制、价格体制等未根本触动,形成企业之间没有平等竞争的条件,经营好的企业得利不多,经营差的企业得利不少的现象未真正改变。针

对这一现象，即企业按统一税率上缴所得税，获利高的企业税后再上缴一定调节税。“利改税”同样起到一定的作用，但双重纳税标准又起到“鞭打快牛”的不良后果，不利于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兴起“承包热”，企业在承包规定期间内实行超收多留、欠收自补原则，对克服“利改税”带来的弊病起了一定作用；但是面对大批国有企业效益差、亏损比较严重的现实，承包也不能彻底解决问题。究其原因，上述改革均围绕着国家与企业在利润分配上兜圈子，限于分配领域，没有触动旧体制要害处，因而在改革之初收到一定效果后便很快不再灵验。1991年下半年提出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并且出台转换机制条例，提出将企业推向市场，有所前进。1993年11月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将改革推向新的阶段。按照《决定》的阐述，现代企业制度，一要产权关系明晰，国有企业产权属于国家，企业拥有法人财产权，成为承担责任的法人实体；二是企业依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实行政企分开，对出资者承担资产保值增值责任；三是出资者按照投入企业资本额享受所有者权益，包括资产受益、决策和选择管理者权利等。企业破产时，出资者以投入企业的资本额对企业债务负有限责任；四是企业依照市场需求组织经营，政府不直接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五要建立科学的企业领导体制和管理制度，调节所有者、经营者、职工之间的关系，形成激励与约束相结合的经营机制。一年多来的实践表明，已有一些企业在改革中取得成效，建立起具有新型经营机制的公司；但是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进行改革，其经营机制不仅是转换问题，而是一定意义上的重新再造问题，因而改革起来相当艰难。

城市经济改革中还应提到价格改革，建立主要通过市场形成价格的机制；在发展商品市场同时，发展劳动力、金融、房地产、技术、信息等市场，构成完整市场体系；建立适合企事业单位和机会时点的工资及其增长制度，包括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

福利、优抚安置、社会互助、个人储蓄等在内的社会保险制度，尤其是失业和养老保险体系，是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中不可缺少的配套改革。

虽然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远比农村复杂的多，也困难得多，收效也不及农村那样迅速，但仍比较明显地看出改革的市场取向。以国有企业为重点的城市经济改革，无论是早期以扩大企业自主权、放权让利的改革，还是后来建立产权明晰、政企分开、责任明确、管理科学的转换经营机制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都向传统的高度集中统一、政企不分、效益不高的旧的企业体制提出挑战，取向于平等竞争、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适合市场经济的企业。至于价格、工资、失业、养老等配套改革的市场取向更为明显，正一步步向着市场经济体制逼进。无需更多赘述，过去发生、现正进行、将来更加明确的市场取向的城市经济改革，对于城市家庭经济的来源、结构和变化趋向产生很大影响，并且影响着包括生育在内的人口变动。

（三）市场经济与微观人口变动

中国大力控制人口增长和加强计划生育工作，始于70年代早期。当时正处于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政治思想领域形而上学教条主义泛滥，人们的思维方式是自上而下，由国及家；而不是由下而上，由家及国。更为重要的是，正当各国竞相加快速度发展，实现二次世界大战后加快经济起飞时，我们自己关起门来打内战，使本来十分落后的社会生产力更加落伍，国民经济长期停滞不前。而这种低下的生产力，在当时农村以手工和半手工劳动为主情况下，孩子的抚养费用较为低廉，但确能够给家庭带来明显经济效益。这在城乡公有制经济一统天下，城市主要为国有经济，乡村主要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以及“大锅饭”一套分配制度下，家庭添人增口没有后顾之忧，劳动者的数量就是他们的质量，知识不能在生产中体现其价值和应得的报酬，加上计划经济在粮食、布匹等生活必需品和住房等的按人头分配，多生多

育有着明显好处。这种情况下如采取国外那种单纯服务型的“家庭计划”，则很难取得多大效果。另一方面，60年代末中国人口总数即超过8亿，人口年龄结构异常年轻化，增长势能强劲，控制人口增长任务十分急迫。同时中国有着自己的具体国情，除人口多、生产力不够发达外，是一个有着严密组织的高度集中统一的国家，或者如同某些西方人士所说是一个“有组织社会”，可以发挥政治组织优势。正是在这诸多情况交汇综合下，中国政府大力控制人口增长把重点放在了宏观上。首先将控制人口增长纳入国民经济发展计划，提出人口增长控制目标；其次制订为实现这一目标的政策和措施，并在实施过程中从上至下建立起计划生育机构；再次在实践中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做法，不断将以宏观人口控制为重点的工作推向前进。现在看来，在当时人口控制要“急刹车”条件下，是一种必然的选择，实践证明也是成功的选择。然而在20多年后的今天，特别在改革开放和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过渡新的历史条件下，人口控制的重点是否继续放在宏观上不动，有无必要转向中观和微观？我们认为回答是肯定的，有必要明确提出逐步实现人口控制由宏观向中观，尤其主要向微观的转移。这是由于：

其一，宏观人口控制的相对稳定。从实践上看，中国的宏观人口控制主要着眼于人口控制目标、生育政策和控制手段，当前这三个支撑点都处于相对稳定状态。

人口控制目标的相对稳定。目前，第一步本世纪末全国人口控制在13亿的目标已经确定下来，且是比较有把握的目标。第二步长远人口发展战略目标的确定，实现人口的零增长也为各界所认同，并且国内外的多种预测大同小异，预计下一个世纪中叶全国人口达到16亿左右时可以实现零增长。第三步零增长后人口控制目标的选定，有两种意见：一种是保持替换水平生育率，总人口保持在略低于16亿水平；另一种是从我国自然资源、环境、经济和社会发展实际出发，确定适度人口目标，而具体目标的选定

从七、八亿至十来亿不等。我们以为，适度人口的研究是有益的，但不要忘记那是五、六十年以后的事情，在此期间内的人口控制目标是不会有更大的变动，而且最终理想人口目标的实现也必须建立在达到零增长目标基础上。

生育政策的相对稳定。1980年中央在正式出台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之前，曾经召开多次由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和部分专家学者参加的座谈会，对独生子女各种问题进行多层次、多角度的讨论。这些问题，如人口老龄化、劳动力供给、社会赡养等在随即发表的中共中央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中作了阐述；但关于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维持多长时间等，是关键的问题，需要明确。笔者在参与起草给中央的《关于座谈会情况的报告》文件中，本着认真负责精神，以个人名义附上《目前我国存在的人口问题》、《关于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方案的建议》两个附件。后一个附件论证了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既非权宜之计，很短几年难以奏效；也非永久之计，时间过长就会造成诸多人口堆积问题；而是一定时期的一种特殊政策，这个“一定时期”定义为一代人，即25年左右。这样，一可有效控制住人口的猛烈增长，控制住一代人的生育率减少了下一代做父母的入口，自然再下一代及以后的生育可以受到有效控制。二可使生育一个孩子带来的人口问题不致过于严重，如人口老龄化可控制在一定限度，社会负担可以承受等。个别家庭可能出现老年、中年、少年“四二一结构”，整个社会则不会出现。15年来的实践比较好的坚持了这一生育政策，既大力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各地计划生育条例又都明文规定，双方均为独生子女结婚者可以生育两个孩子。近年来中央多次强调政策的稳定性，因为任何变动，无论是收紧还是放松的变动，都会在实践中导致生育率的升高。

人口控制基本方法的相对稳定。中国大力加强人口控制20多年来，积累了一套成功的做法和经验，诸如领导重视，实行人口

目标管理责任制；坚持宣传教育、经常性工作、避孕为主的“三为主”做法；提高干部素质，注重队伍建设；加强基层建设，提高服务水平；应用先进技术，开发生产高效、安全、便捷的药具等。在当前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过程中，要随着情况的改变，最终过渡到以利益调节为主的管理机制；但在相当一段时间内，这些行政管理方法的有效性不容置疑，处于相对稳定状态。有一种观点认为，实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就应将人口生产和计划生育推向市场，实行同国外一样的“家庭计划”。这是值得商榷的。不说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需要较长时间，不具备可以接受人口生产的完全的市场；就所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本质特征说来，也是不切实际的。前已叙及，市场主体法人化是市场经济的首要特征，我们能否将其推演到人口生产，将生育子女数量多少，何时生育，生男生女都变成个人家庭的市场行为，完全由家庭自己决策，政府不能干预呢？显然不能。中国控制人口增长的顺利进行，固然有经济、文化、社会的发展进步作基础，但它既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由发展决定的生育率的自然而然的下降，也有别于某些发展中国家的“家庭计划”，而是由中国特殊国情决定，主要依靠行政手段实现的。如果我们放弃以行政手段为主的一套做法，由生产率下降与经济发展程度之间“时间差”造成的“反弹力”就会释放出来，重使生育率上升。要素流动市场化、宏观调控间接化等市场经济特征，也不能原封不动的搬到人口生产中来。除劳动力市场应当充分发展，并使之规范化外；人口生产尤其是影响生育控制的各种要素，如生育控制指标、使用B超进行胎儿性别鉴定等则不能搞市场化，还需要政府的直接的宏观调控。

其二，微观人口控制的增强。在宏观人口控制目标、政策、方法处于相对稳定情况下，微观人口控制怎样至为重要，作用得到增强。

一般情况下，任何社会的宏观人口目标、政策的实施总要落